

翰墨心情

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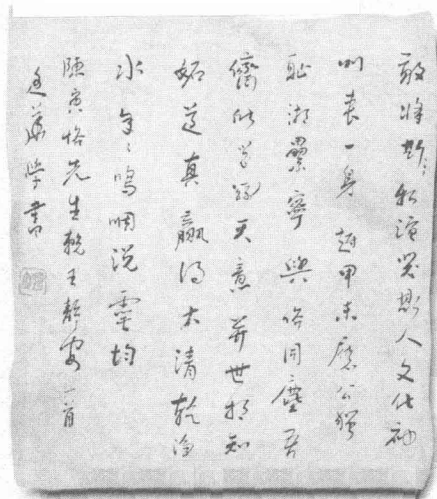
● 李廷华 著



- 悲剧精神中的屈原与庄子：王国维和钱钟书
- 永远的高二适
- 欲休还说王子云
- 见到和读到的季羨林
- 启功的字与诗
- 书法界人物素描
- 读谢无量

翰墨心情

廷华 著



悲剧精神中的屈原与庄子：王国维和钱钟书
永远的高二适
欲休还说王子云

见到和读到的李袁林
启功的字与诗
书法界人物素描
读谢无量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翰墨心情/黄君主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10

(当代书画家随笔丛书)

ISBN 7-5402-1346-9

I. 翰…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710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54 印张 1284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4000 册

定价:(全十册)98.00 元



何之

《当代书画家随笔丛书》

总序

黄君

奉献在读者眼前的这套书画家随笔,是笔者继编辑“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之后的一次新尝试。丛书的作者是近年书画领域一批“不大不小”的人物。说他们不大,因为他们都没有特别显赫的头衔,也不把持什么重要的位置。而说他们不小,则因为他们也都是书画内的名流。如果不是书画艺术静态的特征,如果书画艺术也象影视、歌舞那样,直接占据重要的宣传媒体,或许他们的名字也会象诸多影视明星一样红得发紫。不仅如此,这些作者还有一个不可小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自觉关注中国文化发展命运,是一批具有责任心的书画家和学者。多年来,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获得了关于书画艺术以及社会、人生诸方面的切身体验,曾经以自己的言论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有些人如李廷华、傅京生、周祥林、于明诠、叶鹏飞等,至今是同行关注的热点人物。

目 录

1 序

文心寻觅

- 1 悲剧精神中的屈原与庄子
——王国维和钱钟书
- 4 诗文反差
——聂绀弩和钱钟书
- 10 永远的高二适
- 16 欲休还说王子云
- 22 当年臧否竟成讖
——读《积微翁回忆录》
- 28 “堂吉珂德”何处寻
——读《吴宓日记》
- 33 齐如山的“两境”
- 36 读吴梅
- 39 蔡园读歌
- 41 胡适故里
- 44 吴宓故里

48 在马一浮纪念馆

50 绝唱

——林散之和高二适

56 郑板桥·启功·钱钟书为文心性之异同

59 见到和读到的季羨林

62 冯其庸先生

64 余秋雨的清爽

艺事说荟

66 闲话康有为

69 孩儿体与风云气

——读谢无量

71 傅抱石以画为诗

73 直气横扫翰墨端

——读黄秋原

77 王朝闻：此曲只应天上有

79 启功的字与诗

83 卫俊秀晚年变体

85 翰墨神交叹高陆

87 陈大羽不忘故人

89 与贾平凹夜会京衢

92 书法界人物素描

——王方字、吴丈蜀、刘正成

98 失败的采访

——访黄裳、访陈少默

103 诗国风采各径庭

105 书法传统与人文精神

——与沃兴华先生商榷

涉戏三谈

110 京剧《曹操与杨修》断想

悲剧意蕴中的屈原与庄子

——王国维和钱钟书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学说多有引述,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引西方近代哲学、心理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开山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及王国维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时认为:“王氏游学日本时,西方上庠名宿尚鲜发扬传播中世纪哲学者,东海师生稗贩肤受,知见不真,莫辩来牛去马”。钱钟书先生对王国维论《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之理由引述概括后说:“洵持之有故矣。然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也。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微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近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语,含饴还同嚼蜡。”(《谈艺录》补订本 349 页)

比较钱钟书与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解析,可以发现,王国维称其为“悲剧之悲剧”;在钱钟书眼中,王氏似还未真正窥透

人生之大悲剧。王国维的一生终结,本身就是人生之悲剧。后世学者称其自沉昆明湖为“殉中国之文化。”钱钟书之文章,集金沙而成伟器,庄俊中亦间调啸,询为当世之大喜剧家。其实,钱先生又是一个其“悲”入骨之人。写钱钟书传的美国人胡志德在其文中多有论及钱的悲观主义。小说《围城》没有《红楼梦》中宝黛之爱那种铭心彻骨荡气回肠的情感强度,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爱情一开始便有些漫不经心的味道。方鸿渐自一出场便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曾经“红海”,还是堕入了与孙柔嘉的爱河。正如钱先生言及王国维论《红楼梦》诸语时所谓:“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相较而言,《围城》意绪,既不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的对爱情理想之毁灭痛彻肝肠,也不像王国维论及《红楼梦》时对悲剧艺术、悲剧理论倾注那样的执著而近“胶著”。或许钱先生看得太透,悲剧即悲剧,喜剧亦悲剧,他才将调侃作为隐迹人海,回护心灵的盾牌。看透了人生的大悲剧,所以他总是在笑。

悲剧之发生,悲剧人物之产生,原因最著者是因为有理想或言幻想在。理想之未就是为遗憾,理想之被毁是为悲剧。理想之中原有悖论,理想之发展亦将伴同悖论之显现。故而人类之大理想,往往隐含大悲剧在。王国维之文心哲理,盖出其性情,他对悲剧理论的渲染,又渲染了他的悲剧人生。

钱钟书先生认为王国维认同叔本华而未能深谙叔本华,即以《红楼梦》之评论为例,“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逮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人情,何势削足适履”。以钱先生此处之说,《红楼梦》还够不得叔本华意义上的悲剧。因宝黛之爱尚未成就,若青果未熟,何须言烂;“围城”未进,谰言其出?倘若可以将悲剧因其程度划分为等级的话,《红楼梦》所叙之小儿女不成佳耦,似尚在“初级”。“冤家”尚未成家,“佳耦”未及萌怨,故不足为叔本华定义之“悲剧之悲剧”也。至于曹雪芹之大才椽笔,

将这一“初级”悲剧写得淋漓尽致，正是题材未必决定的好例。钱钟书先生说：“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阂。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显见，钱钟书先生丝毫没有看低《红楼梦》。《红楼梦》在他眼中，不是“悲剧中的悲剧”，但并非“悲剧中的悲剧”方称“佳著”。钱先生是明白地以为《红楼梦》之底蕴未可与叔本华理论牵强。钱先生说：“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谈艺录》补订本第351页）小说之丰富性与理论的精微性可有融和之处，但很难丝丝入扣，完全互为发明，而理论家在论列排比之际又难免强为撮合。钱钟书举了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以阐此理：“西方旧谑，有士语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自憾貌寝。卿绝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则他日生儿，具卿之美与我之才，为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却之曰：‘此儿将无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丑且愚，则天下之弃物尔。君休矣。’”钱先生此例，形之王国维引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似乎将绝对性取代了可能性。不妨在这里钻一个小小牛角尖。才子之智与美人之貌虽未必能完全融和而臻绝妙结果，纵有几分成果，亦胜却人间无数。再以王国维引叔本华理论而阐《红楼梦》言之，固未必穷尽叔本华理论之妙谛，实已启《红楼梦》研究之新说，亦如佳女才人之结合，已得几分风流，未可真若“既丑且愚”观之矣。钱钟书先生论学，文意求精，词章撷华，间杂噱弄而喜“充类至尽”。钱先生说：“吾辈穷尽气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体。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不贤识小，以为钱先生之论王国维，略如窥万方之眼观一心倾注之象。王国维之为文，似呈苦态；钱先生之谈艺，每现噱心。进而言之，王国维有些像悲剧意蕴中的屈原，而钱钟书则颇类庄子。

诗文反差

——聂绀弩和钱钟书

最初读鲁迅著作时，乍然看见“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两句，百思不解，甚至有时纳闷鲁迅好象不十分革命。有病不吃药的情况见得多：撒娇，怕苦，自信病莫奈我何，或者囊囊萧萧两袖寒。为什么偏要到无聊时才读书呢？明窗净几，气爽神清，正襟危坐，红袖添香，难道都比不得无聊时读书之趣么？

马齿渐长，自己也到了多病而颇多无聊的时期，病榻久卧，颈硬腰直，自然无力作什么学问，昏昏睡久或自生闲愁又不甘心。何以解忧，惟有读书。这时读的书起码是不能使人累，而多少要使人快活，使人忘记病。

第一本给我以病中忘病、无聊中有聊之快的书是《围城》。第一次读完《围城》确实得到一种全新的快感。

过去眼中大作家们堆积起来的文学高峰在钱钟书的噱笑里突然变得象龙钟老

态、拄杖凝目的威严道士。我甚至觉得钱钟书是在以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对文学本身进行戏弄。以前学作文，总听到一个声音：不要写过程。而《围城》就全是过程，全然没有一部教科书意义的长篇小说应有的伏笔、穿插、照应，矛盾的激化和转化、高潮等等。然而就是这“写过程”的书成了我的枕边之物。通读不下五次，零碎翻腾难以计数。说实话，我至今没有想过要从《围城》学到小说作法。我只是觉得它有趣，智慧表现的绵密使读者在每一页都可以驻目留连，我甚至认为《围城》是专门方便病人，而且是懒人的书。不象有些大部头，要翻上许多页，才得着点会心之处。试想卧病之人抱着一块大砖头在床上辗转反侧，即或有趣，也且多苦。《围城》则不然，随便翻上一页，趣就来了；不论过了多少天，再随便翻上一页，趣还是不减。

《围城》之使我得趣后几年，又买到一本聂绀弩著《散宜生诗》。那是在一个劳累了整天的人夜之时，以为一本旧体诗集，看几页或可起催眠之效，谁知一翻开，便阖不上，连例常的熄灯之前要饱饮一通茶水也顾不上了。半夜，我在《散宜生诗》后写了这样几句感言：“终日把卷未启扉，怡倦眼翻‘散宜生’。老来诗格人称怪，盖世文章我叹奇。入幽默境笑出口，沉深邃处泪沾衣。唇焦未敢觅啜茶，阖卷已近午夜时。”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的事。从那以后，《散宜生诗》和《围城》成了我疗病的辅助药物。

最近又卧病，还是这两书伴我，九岁的女儿说：“你应该看点有趣的，增加智力的书，象 365 夜。”我说：“这就是我的 365 夜。”

《围城》是已经上了街头书摊的畅销书，又兼电视剧渲染，基本是家喻户晓，其中妙处不须我饶舌。《散宜生诗》初版印数 1500 册，现在再要到书店找十分困难。其诗如何使人难忘，我这里引录几首，且试诸君趣也不趣。

《削土豆种伤手》

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球鞋》

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
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
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
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

我曾经对不少朋友读聂绀弩之诗，大抵超过电视荧屏里那些笑星“看你笑不笑”的效果，篇幅所限，且煞笔痒。否则我真想再抄它几首。需要多说一句的是：聂绀弩其人曾在黄浦军校当过教官，在左翼文坛长期追随和捍卫鲁迅，解放初期作过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在文艺界算得上是相当有地位的人。而上录两首和《散宜生诗》中的最精采部分，都是他五十年代中期遭了冤案，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时的生活实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其诗如此，真非幽默两字了得。不过，我将《散宜生诗》和《围城》作为疗无聊之病的药饵，贯常服之，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幽默。我自以为当代中国文坛，钱钟书和聂绀弩是幽默大家。钱之幽默，如万斛流泉，不择地而出，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得不止。钱之幽默不强调，也不引伸什么意义。聂之幽默，则是触处生辉，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总要引伸到家国大业，颇有每饭不忘社稷的味道。

由于对钱钟书、聂绀弩两位“幽默”的喜好，便尽视野所及，追寻他们的其它著作，其癖有如得到一只好蛋，还想知道下蛋的

鸡模样,或其它同巢之蛋。找到绀弩先生的小说集一部,读后全无印象;论文随笔集一部,读后知道绀弩先生是个意志十分明确而固定的人。绀弩先生议论文章和小说深深地打着几十年前文坛壁垒分明的烙印,我印象较深的一处是,沈从文先生因为某些文艺观点和鲁迅先生有所不同,绀弩先生便大张挞伐之笔。当其时,那字里行间硝烟味十足,丝毫觅不见什么幽默。看来,聂绀弩先生是把他的认真、专注甚至某些固执全部贯注到了文章之中,而把幽默、调侃渗透到了诗里。这又使我觉得,一个作家完全可以有两副或多副手笔。可是,话再说回来,三十年代以笔做枪,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聂绀弩,未必能同时又写出《散宜生诗》里的那些篇章。如果不是在遭到命运的大捉弄之后重新审视内外两个世界,可能他的文章风格会一以贯之,那对于中国文坛的损失将如何,愚不敢测度。起码,我在无聊懒病之时床头会缺了一副药饵。

看了聂绀弩的诗才去注意他的小说论文,而读了钱钟书的小说和论文之后,也使我注意到他的诗。据中国和平出版社的《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一书附录的《钱钟书著译目录》记载,钱钟书最早的创作是诗,是旧体诗。而且,早在《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这三部散文体创作问世之前,他已有多首诗作发表。现在找不到钱先生的诗集,只能从其它著作中发现一些零篇。这里各引一首先生五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诗作,略呈臆见:

《雪窦山纪游》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
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
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
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祇解别仁智。

据杨绛先生解释，此诗作于抗战初期，钱钟书先生由上海往湖南谋职途中，也就是《围城》小说中方鸿渐、李梅亭们那昏昏暗暗的行次。此诗写得明白易晓，仿佛宋人所出，而且以学问入诗，以议论入诗也是十分显然的。从这首诗，使我们看到一个与写《围城》那样噱口不绝迥然天涯的钱钟书。如果说绀弩先生的诗文格调的反差是时代变迁所致，而钟书先生则确实老早就独具两副手笔。再看一首钱先生作于五十年代的五绝：

《赴鄂道中》五首之一

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纷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祇教疏凿别清昏。

据杨绛先生介绍：这是1957年《宋诗选注》脱稿后所作，当时钱先生以自己不能从事创作，而只能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是有些遗憾的。从这诗的诗风看，还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钱先生写这诗时，《围城》等小说早已出版，幽默大家的品格早已形成，但是，在诗中丝毫看不出来什么幽默。如果说聂绀弩在写批评沈从文等战斗性论文时，以幽默入诗或者还在不能为之际，那么，此时的钱钟书先生的不以幽默入诗，显然是不屑为了。窃以为：钱钟书先生对于诗，其实有别一番钟情在，他写得十分认真，似乎不愿意将小说中那些噱笑渗入诗中。以当时诗坛泰斗的趣味，凡宋诗，管你苏子瞻，还是朱晦庵，一律“味同嚼蜡”。钱先生自己倾注精力的《宋诗选注》难免坐冷板凳，钱先生自己已经形成的宋人诗风又遑论哉。

因为喜欢钱钟书的小说,我留意起他的诗;因为喜欢聂绀弩的诗,我留意起他的其它文字。读去读来,结果是:读钱钟书的小说,小说在吸引我;读钱钟书的诗,是钱钟书在吸引我。读聂绀弩的诗,是诗在吸引我;读聂绀弩的其它文字,是聂绀弩在吸引我。无聊时读书,此抑或一得乎?

《美文》1992 年创刊 2 号

永远的高二适

高二适先生逝世 20 年了。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几乎没有因书法获得过报酬;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近千首诗作至今未能出版。今年夏天,我在南京寻访高二适的后人和学生,寻绎他的墨迹;10 来天的时间里,虽然还有其它不少活动,但萦绕心胸难以挥释的,全是关于高二适先生的种种。

二适先生是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据他的后人解释,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以这种心性,生在 20 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高二适先生早年在家乡教小学,孤诣奇才,使他得到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岭南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的赏识。章、陈二位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是非恩怨集于一身。陈树人虽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 1945 年国民